

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余英時題 

楊正顯

魏綵瑩

黃克武

梁裕康

曾國祥

Quentin Skinner

Richard Bourke

Peter Zarrow

2

ISBN 978-957-08-4363-7

00480



9 789570 843637

建議分類：歷史文化、思想

Intellectual History

思想史

發刊辭

編輯語

論著

楊正顯 白沙學的定位與成立

魏綵瑩 廖平論《春秋》撥正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從「二伯」的理想談起

黃克武 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

梁裕康 自由與必然——對霍布斯相容主義的一種脈絡分析

學人專訪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uentin Skinner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Richard Bourke

研究討論

Peter Zarrow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Datongshu and Looking Backward

書評

曾國祥 評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

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2

2014年3月

思想史

思想史 2

2014年3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著 思想史編委會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25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文聯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編輯 陳逸達
封面設計 沈佳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363-7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i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思想史 2/楊正顯、魏綵瑩、黃克武、梁裕康等編著。

初版，臺北市，聯經，2014年3月（民國103年）。

352面，14.8×21公分（思想史：2）

ISBN 978-957-08-4363-7（第2冊：平裝）

1.思想史 2.文集

110.7

103003090

思想史第2期編輯委員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Miaw-fen L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沙培德	康乃狄克大學歷史學系
Peter Zarr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陳正國(主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Jeng-guo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蕭高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Carl K. Y. Sha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編輯顧問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	David Armitage	Harvard University
余英時	普林斯頓大學	Peter K. Bol	Harvard University
村田雄二郎	東京大學	Benjamin El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林毓生	威斯康辛大學	Knud Haakonssen	University of Sussex
張 灝	香港科技大學	Jonathan Israe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inceton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	Nicholas Phillips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葛兆光	復旦大學		
羅志田	四川大學/北京大學		

助理編輯

林勝彩 羅皓星

(依姓名筆劃排序)

發刊辭

整體史學之興衰與思想史之興衰相維；反之亦然。

史學興盛的原因眾多；有緣於外部因素者，如某類重要或大宗史料的突然出現、政治因素的推波助瀾、學科建制化之後的自我複製與再生產的能力等等；但真正能讓史學持續灌入活頭源水的原因，則在於吾人主觀上對重要歷史課題的強烈好奇；以及足以將好奇轉化成學術議題的社群對話。史料、政治或知識環境固然可於一時之間創造史學研究的能量，但研究者能否從史料爬梳、凝塑出具深遠意義的課題，從而回饋給政治環境以多元反思的歷史理解，則與史學社群對歷史學的持續回顧與提高視野密切相關。如果歷史學界不願將這類自我理解與反思的功課交付給專事方法論的哲學家，那唯一的可能，或許就是有待思想史從業人員更積極地介入此道，讓整體史學能夠從中汲取足夠的養分。

上述所言不等於冀望思想史家自命為史學界的導師。正好相反，許多思想史家在創造議題之時，只是史學軍團的游擊兵或初入史學花苑的小園丁。思想史家無法告知我們真實如何取得，或史學應當如何等等認識論的規範真理，而毋寧是提出議題及其重要性的討論。胡適當年「截斷眾流」，將春秋時期之前的思想論述從中國哲學史中剔除，無疑正面地激撓了當時的史學重要議題。馬克思提議的資本主義

批判史觀，不只導引了近代討論資本主義興起的史學重鎮——例如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等人，也造成現代史學對下層社會歷史的關注。他們都未曾自命為思想史家。但無疑的，若要周全地討論近代思想史，他們的著作或想法絕對不容忽視。他們都關心於如何將歷史概念化、意義化、問題化；從而能夠介入重要的歷史議題。

從概念到重要歷史議題中間的論證發展當然有許多種路徑，其關係也不是一路平遂，常常充滿糾葛。但開放地接待概念與歷史議題之間的關係，或許是對思想史研究最佳的「定義」方式：思想史不是個既定的領域，它的疆界，或正確地說，它的生命注定隨著概念與歷史議題之間多樣的關係之開展而開展。如果討論一件宋代陶器時不預設所謂器型、風格或歷史脈絡是既與或既定的，那麼研究者勢必得從器類的思維範疇開始進行思考研究，進而了解此陶做為當時美感秩序、生活秩序、甚至禮儀或政治秩序中的因素或配件的地位與意義。再者，工藝之內容反映美感價值之分疏、判斷、選擇，正如同工匠的社會存在反映時代對職業、人格、地位、榮譽等等的價值態度。統整各類細微價值而描繪出某一歷史社會、族群的人生態度、價值取向，是思想史家正當且當為的知識目標。

將思想史的畛域推至如此之大，其實是漢語思想史之傳統使然。近幾十年來，隨著史學的專業化，漢語思想史家們對某一文本、思想史人物、甚至時代思想氣氛的研究與日俱進——其成果也確實令人燦然欣喜。但是過度的專業化永遠有自我區隔的風險。如何讓漢語世界的思想史重新與整體史學的命運密切聯繫在一起，應是此刻思想史研究者不可迴避的課題。本文首揭「整體史學之興衰與思想史之興衰相維」，此義甚難以分析方式證成，只能以「歷史經驗」或「選擇之親近性」的方式略以示意。衡諸近百年之世界史學，應以法語、德語、

英語、華語史學界為四大傳統；應無疑義。而法、德、英語史學均有其獨特而擅場的「思想史」傳統，迄今未衰。法語世界有「心態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史學寫作，強調社群於長時間的集體心態或世界觀。無論學界對於何謂「心態史」、何人可為代表有所歧見，此一特色史學與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年鑑學派（Annales）強調長時間、社會、經濟、人口等面向的史學發展息息相關，殆無疑義。德語世界則有「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提法，認為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於掌握概念之變化以及概念與其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個史學傳統既有19世紀黑格爾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遺緒，也有現代德國哲學與社會學的特殊影響力。英語世界在一九四〇年代有注重西洋文明傳統的美國學者 Arthur Lovejoy 所提倡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一九六〇年代後有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所強調的觀念之脈絡史學（contextual history of ideas），認為歷史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再現觀念本身，而在分析觀念的使用者與其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此種說法顯然與柯林烏（R. G. Collingwood）以及奧斯汀（John Austin）的思想（史）研究傳統有關。此外，歐美與英國尚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所啟發的思想史研究，例如 Keith Thomas、E. P. Thompson、Gareth Stedman Jones、Christopher Hill 等人的著作。如果單以社會史來統稱這些著作，顯然忽略了他們對於觀念的重視與分析，也過度撕離了思想史與整體史學的關係。而義大利裔的 Carlo Ginzburg 膾炙人口的 *The Cheese and Worms* 其實是精采的庶民思想史作品。總而言之，這幾個大史學傳統各自有其相應的「思想史」傳統。這絕非偶然，而是兩者之間形成回饋的循環有以致之。

淵遠流長且勝義迭出的漢語史學及其思想史之間的關係，與上述傳統其實並無二致。唯一差別在於華語世界有「樸學」的傳統，較缺

少哲學或方法論的辯證與語言來對自身的知識操作進行定性的工作。其實，漢語世界的「思想史」是個光譜或幅員相當廣的史學次領域。它涵蓋對觀念、概念的關注與分析，也包含智識份子的研究。甚至，緣於秦漢以降漸次成熟的經籍志、四部、學案、乃至有清一朝的考證學傳統，使得在近代漢語學術中，思想史與學術思想史很難完全切割；甚至在加入政治史或制度史研究體例之後，有「制度思想史」這樣少見於其他重要史學傳統的概念。漢語世界此種學術底蘊，造成自一九二〇年代起，風起雲湧的思想史研究盛況。梁啟超、錢穆等人固然是自認且公認的前後相望的思想史大家，其他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史學之大者，如前者的〈殷周制度論〉，後者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許多論文其實也都牽涉到制度與思想或大傳統的價值體系。如果思想史家錢穆的制度史寫作，是以通貫的史學思想為中國歷代制度加以定位，透顯制度背後的價值體系，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著作則是以制度說明大傳統或社會心態的結構力與滲透力。甚至一般認知裡，不被視為思想史家的史學教授，其著作也多半觸及，甚至處理思想史課題，例如沈剛伯從社會地理，討論先秦法家的起源與流派，以社會史著稱的李宗侗不只研究史學史，也注疏《春秋公羊傳》。即使是標榜「唯物史觀」的一些史家，如翦伯贊、郭沫若，尤其是侯外廬等人的史學作品，都相當關注思想與思想史。換言之，這一群被稱之為早期社會史的研究者，其實都有很深的思想史涵養，這使得他們的史著能夠對其他同行產生較大的啓示。甚至常被誤認為反對思想史的傅斯年，他最好的學術作品之一即是《性命古訓辨證》，也泰半與思想史密切相關。幾乎可以這麼說，不標榜思想史，甚至偶而質疑思想的重要性，懷疑思想史的確定性，卻實質上從事思想史工作並卓有貢獻者，是現代漢語史學的特色。漢語思想史富有豐沛的傳

統與水脈，使得研究者得以左右逢源，或者在潛移默化中，關注（學術）思想史的課題，或甚至運用概念來詮釋歷史。單一的經典思想人物、概念、著作、課題固然值得研究，但積極擴展議題，並努力概念化各類研究課題，期能在概念層次上與其他議題相通、相融而回過頭來搏聚成更具意義與廣度的議題，或許是讓思想史重新成為漢語整體史學之底蘊的唯一可能。

相較於法、德、英語世界的現代思想史寫作，漢語世界的思想史傳統雖然較少方法論的自我釐清與自述，卻有更為寬廣的學術史、制度史底蘊。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左派的「批判史學」與右派的「同情的理解」之間的齟齬如今已然低溫，逐漸相融於同一個史學傳統。加上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遠大傳統，使得漢語思想史在課題廣度、態度、時間向度上，或許尚不足以稱之為遠邁於其他語言世界的思想史傳統，卻鼎足並立而有餘。可惜，雖然自20世紀晚期開始，漢語史學明顯有去意識形態化、去物質主義化的傾向，卻似乎同時也有去思想化的傾向。晚近去思想化的傾向，可能原因是在所謂全球化、普世化的當代政治生活中，一些基本的價值與概念，諸如民主、憲政、人權、正義、國家理論、主權等等常常被認為均源自西方，使得傳統中國或華文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當性需要予以特別說明，或常常只能在反抗西方中心論這種被動論述中建立正當性。另一方面，晚近西方史學中以新文化史為大纛的新物質主義史學，如消費、出版、醫療、視覺、身體、收藏等等史學主題，相當程度吸引了史學界的注意力。然而正如自稱為思想史家的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所展示，身體可以是思想史家的研究思考的自然場所。思想史與身體史或其他被籠統稱之為新文化史或新物質主義歷史的次領域，若始終平行發展，對彼此都是限制。如果思想史要獲取源

頭活水，它顯然可以發展概念化、問題化、意義化歷史議題的能力，將上述次領域的歷史意義——如果不是文獻——考量進去，並加以擴大。

漢語思想史學界的前輩已為此領域留下諸多典範與經典，但今日它所面臨的挑戰之鉅，也遠大於半世紀之前的景況。今日談論思想史而要求有通貫之識或橫跨三個斷代者，已如鳳毛麟角。跨國族或國際化的思想史寫作雖然有引人之處，但其困難度較諸槍砲或傳染病的全球歷史，不可以道里計。或許，在通古今之變與全球思想史之外，思想史可以更專注於議題的整合與擴大。思想史應該更敞懷地擁抱各類歷史議題，期能與整體史學的發展脈動同步。如果思想史家們相信，他們終究不只能回應、預流史學新潮，也能夠概念化、問題化、意義化各式新舊的歷史議題，思想史或許能夠成為其他史學次領域發掘議題、聯結議題、解決議題的靈感來源。此為本刊之所祝願，而願為路橋者。

編輯語

本期共收錄論文四篇，訪問稿兩篇，研究討論一篇，書評一篇。

楊正顯的〈白沙學的定位與成立〉書寫細緻，是年輕學者中難得一見的佳作。楊文旁徵博引，舉凡正史、文集、碑帖、書信、詩詞、墓誌銘、縣志等等與之關涉史料，幾乎一網打盡，鉅細靡遺。該文表面上處理傳統學案體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究竟明朝陳白沙的思想應該歸諸禪門佛釋，還是道家玄學，抑或儒學正宗？是儒學中之理學還是心學？其思想淵源是繞道漢宋，直接上承孟子，還是從宋初二程之理學傳統而來？白沙思想的核心概念或修養功夫的法門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勿忘勿助」？楊文並非採取與白沙同時期的人或與其門生故舊相平行的判教方法，而是採取了學術史，或者可稱之為知識考古的方法，追溯後代所建構的白沙學面目的由來。楊文依照時間順序，詳論張詡、林光、湛若水等門生對江門心學的建構史。根據楊文研究，陳白沙故後，他的弟子之間興起幾個階段的師門學思宗旨的詮釋論爭——楊文稱之為「話語權」的爭奪。

此一同門間對師說的詮釋之爭，是本文的故事核心（另一條交涉但占據相對邊緣，但同樣重要的學術思想史故事是江門心學與陽明學之間的合離糾結）。本文層層剝解歷史文獻之包覆，終至揭露核心——今日學案所通見的陳白沙思想定位，其實是白沙門人中的相對

晚輩湛若水所建立；它其實摒除或清除了先前門人的師說詮釋。

相對於楊文的「詮釋史的歷史」，魏綵瑩的論著——〈廖平論《春秋》撥正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則是「歷史中思想的詮釋」，而且明顯貼近錢穆歷史主義史學，與史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觀念的脈絡史學也相當親近。錢穆的歷史主義認為，觀看歷史人物與思想都必須以他自身的時代問題為座標，以他自身所用的語言為稜鏡。史金納思想史學的旨趣則是鼓勵研究者討論歷史人物思想的論述意向與目的。雖然從後世的角度，或從當時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政治現實來衡量，廖平想以《春秋》經學中思想為綱，建構一套新的文化天下觀，不啻為烏托邦甚至犀幼的想法，但魏文清晰而雄辯地展示廖平思想的時代意義、特質、目的。魏文主要論證有三。第一，廖平思想是甲午戰爭之後的反動，其中尤以對當時國際關係為然。在目睹列強日逼後，廖平相信那源自於西方，在晚清廣為滿漢士人所熟知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 1836）不足以為萬國之訓。他因此立志於通經致用，以其所熟知的中國古代知識，尤其是《春秋》公羊學，提出以中國儒學為中心的（文化的）世界大一統構想。第二，根據魏文的描述，廖平的文化世界體系在思想上是種折衷主義，而他對激烈的改革或革命思想所提出一連串的批判，卻有明顯傳統主義的傾向。廖平強調綱常的重要，論述中國古代政治理念的美意等等，都是以撥亂反正為目的。第三點或許也是本文最重要的貢獻。魏文清楚論道，在感受更緊迫的晚清的國際情勢裡，廖平主張，在公義的前提下，霸道有其正當性。此一觀點顯然與兩千年強調仁恕、王道的儒學正統相當不同。魏文敏銳地點出，這是廖平從向外的天下關懷轉入向內的中國關懷的軌跡。

廖平的春秋學或許是近代中國最後一個，也可能是最驚心動魄的

傳統主義思想創造。從鴉片戰爭以來，許多中國士人便相信西方的現代知識都可以在中國古代經典中找到精義。這種自古有之的信念，成為他們持續相信大同、大一統、普世主義的最後支柱。但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族革命，乃至五四思潮成為主流之後，這種大同世界或普世主義就逐漸銷聲匿跡了。黃克武的〈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就是在這背景下所出現的課題。簡單說，以中國為某種意義下的中心，並據以形成普世政治或文化秩序的想像已經成為歷史。至少，發言的方式與姿態越來越採取守勢，是一種爭取發言的義憤，而非如傳統帝國恢然大度的自命。在此背景下，取而代之的課題，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或地方的文化意義如何被保存，或融入西方主流。黃克武的文章顯示，在西方科學成為現代性之主流的過程中，尤其是中國對於西方科學的吸收與繼受過程中，中國地方知識如扶乩、通靈、道家信仰等等元素，曾使得這個過程變得崎嶇、有趣。從近代史研究的角度看，黃文可以讀成兩個主題。第一是在中國的靈學活動。此部分是建構一個較少人注意的邊緣歷史，而其價值，也正在建構之本身。就其建構而論，本文採列豐富，短期內難有出其右者。第二是靈學活動與論述對後代的意義。黃文認為後來在五四時期熱鬧辯論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其實是在靈學脈絡下展開的。這一論斷無疑深化了近代中國思想中的科學主義（郭穎頤語）命題，同時也可能豐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在近代中國各式學科中強調科學的洶湧論述裡，靈學研究的聲音相當微弱，相關期刊的壽命極為短暫。但不可否認，「靈學」概念本身，就是新時代的產物。它既可包含扶乩、通靈之傳統文化，也可以納進催眠術這等與精神醫學相關的現代西方科學。靈學是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轉變中被創造出來的知識概念；正好出生在精神的或迷信的東方，與物質的與科學的西方的文化代理者激烈相互拉扯的

時代。黃文宣稱，對照靈學研究與相關團體的活動，「在近代中國，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範疇，一直是多元、模糊且游移的，並與宗教、迷信等概念相互界定。」這是底蘊相當宏大的宣稱，值得相關學者注意。

梁裕康的〈自由與必然——對霍布斯相容主義的一種脈絡分析〉處理對象或許是英格蘭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霍布斯。梁文的旨趣是追問，為什麼霍布斯需要回應 John Bramhall 有關自由意志的質問。以往論者多半將此一「自由 vs. 必然」之爭辯，視為對英國內戰（English Civil War, 1642-9）的回應。梁文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此一辯論有其非政治或歷史的背景或脈絡。在哲學與科學領域中，「自由 vs. 必然」的辯論同樣有意義、重要。這是霍布斯之所以必須正面回應的理由。換言之，理解霍布斯文本可以不只限於單一脈絡，如此才能更明白，此一辯論的底蘊。梁文花了極長的篇幅，極細緻的文字討論霍布斯如何在邏輯學與自然科學前提下，鋪陳他的相容主義觀點——自由意志與決定論不是互為悖反的兩造。在考量所有造成世界運行或變動的原因之關係後，人們應可理解到自由意志並不會造成另一種運行結果。本文的重要底蘊，當然是企圖豐富 Quentin Skinner 的脈絡史學，將 Skinner 的單一脈絡擴展成多重脈絡的理解。從形式上，這是非常具正當性，且令人欣喜的提議。

正巧，除了上述四篇嚴謹而重要的論文，本期也收錄了兩篇訪問稿，其中一篇就是 Skinner 的訪問。Skinner 於 2013 年 5 月來台主講中研院講座。陳正國與蕭高彥利用此機會，請 Skinner 就他長期以來的觀念的脈絡史學研究、新近的觀念的系譜研究、對共和主義與霍布斯研究的個人感受、對當前的思想史研究與寫作、對有志於思想史研究的年輕人的警語等等提出回應。此訪問應是 Skinner 對一些學術問題

的最新反思。

另一篇訪問稿是由 Alvin Chen (陳禹仲) 在倫敦大學瑪莉女王學院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訪問該校思想史重鎮，也是 Skinner 同事 Professor Richard Bourke 的訪問稿。訪談內容相當集中於 Bourke 近年對 Edmund Burke 的新發現與研究。對 Burke 研究者以及有志於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此一精采訪談錄很有提示的作用。

創刊號中，David Armitage 發表他對思想史國際轉向的觀察，其中略及比較思想史的研究。究竟比較研究的範圍或思想之母體應如何設定？時代？社會潮？思想家？還是文本？這些母體或單元應該是異地而同時還是可以異地異時？或許從方法論上談論比較思想史，其困難與問題要遠比全球思想史、觀念的脈絡史等等其他議題來得複雜。Peter Zarrow 的研究討論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Datongshu and Looking Backward* 不談論上述這些後設的問題，而直接以比較思想史的實作當作試金石，來展現這條勢必崎嶇但充滿挑戰的道路可以如何邁開大步。Zarrow 以分別完成於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與美國的兩分文本，康有為的政論《大同書》以及 Edward Bellamy 的小說 *Looking Backward* 平行論述，期待可以藉比較閱讀，讓讀者得到相互闡發的體會：不同的社會裡的烏托邦思想是否會具有不同的動能與內涵。換言之，文化與社會對於思想的形式與內容這兩種不同的範疇，是否會產生完全不同的作用？這是一條值得繼續探索的路。

最後，曾國祥的書評既有深度，也有高度；視之為該書的導讀，恰如其分。臺灣文史與社會科學社群的對話與商榷文字不多見。書評的質與量，有以致也。此書評或可為青年學者之模範。

目錄

【發刊辭】.....	i
【編輯語】.....	vii
【論著】	
楊正顯 白沙學的定位與成立.....	1
魏綵瑩 廖平論《春秋》撥正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從「二伯」 的理想談起	53
黃克武 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 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	121
梁裕康 自由與必然——對霍布斯相容主義的一種脈絡分析	197
【學人專訪】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uentin Skinner	239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Richard Bourke	263
【研究討論】	
Peter Zarrow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i>Datongshu and Looking Backward</i>	283
【書評】	
曾國祥 評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	313